

质在于语言逻辑的知识历史,而其本质在于“符号”的语言,并不能保证它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世界之间的绝对严整性。事实恰恰是,由于用于表达知识的语言及相应工具、技术的变迁以及由此带动的一整套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变动,导致意义世界的转换甚或是“断裂”、“革命”(表现为“常识”或“典范”的转移),从而带来文明史的整体变迁。所以人类文明史不是一以贯之的连续的直线发展,而是呈现出阶段性或间断性的发展态势。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认为“知识考古”与“精神考古”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价值。

第三,将应对自我意识的荒谬逻辑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有效方式,实际上是最大程度的肯定了直观的神秘体验式的思维模式,一种试图超越以语言或符号进行意义世界架构的“物我两忘”的思维模式。^①姜生教授认为“以这种独有的回归式超越逻辑,宗教建筑起超越现实、复归宇宙万物原点的通道”。进一步地说,这种直观的神秘体验式的思维模式在艺术与宗教两个领域表现尤力。宗教对于未知神秘世界的心灵体悟是刺激人类认识一切外围世界,应对自身无意义感受,追寻超越层面关怀的有效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人类直观体悟未知世界的认识方式,而科学则致力于拓展人类的已知世界或探索人类的未知世界。可以说,宗教与科学恰如两个无限大的交叉圆一样,分属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有着很大不同却也存在交集的思维模式,个中原因则在于它们都是人类内在需求的外在表达方式。非仅如此,各领域累积而致的经验、知识和信仰实际都是人类为应对其强烈的内在需求而做出的适宜探求,虽然它们落实到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呈现出形态和程度各异的效用,却都是发掘文明史内在驱动力时理应观照到的关键元素,或许这也是姜生教授将荒谬逻辑界定为宗教最重要的构成性要素之一的深刻原因所在。

姜生教授还认为,人与自然界断裂时遗留下来的永远无法弥合的“断面”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切“噩梦”、恐惧的终极生发地,也是人类深层痛苦的终极来源。这个判断自有其深刻启发意义。结合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说这个“断面”也是人类复归自然,克服一切“无意义”的“原始冲动”^②的刺激点。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人类从此与外在的自然世界拉开距离,但人类心灵深处回归自然的“原始冲动”却从未因此而消泯,恰恰是人类内心始终自觉涌动着的这股“原始冲动”刺激着人类的一切艺术创作、宗教体验以及各种潜在的思想行为模式。须注意,对于未经实证的神秘世界,我们绝不能想当然的比附于“科学”,以“封建迷信”等视之,然后断然予以否决与抛弃,在科学主义滥觞的今天尤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或许这也正是姜生教授提出的“再启蒙”^③的关怀所在。

(作者冯渝杰,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研究生。)

一部明代佛教史研究的力作

——读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

卢忠帅

明代由于对佛教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致使佛教的发展大为衰退,特别是佛教义学,基本没有多大的发展。由此,学者们对明代佛教的研究,涉猎较少。最近,台湾学者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的出版(北

① 托马斯·内格尔说,那些对于荒诞所作的通常论证不能成立,“但是我相信它们(荒诞)是想表达某种难以陈述、而又基本上正确的观点”。见[美]托马斯·内格尔著,万以译《人的问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② 这里所言“原始冲动”,不同于柏格森讲生命进化的“原始冲动”,亦不等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不是生的渴望亦非死的恐惧,它是人类复归自然以超越无意义的冲动,是人类对于终极关怀或终极意义的慕求。宗教的实质便是一套应对“无意义”的激烈冲动和荒谬逻辑。

③ 姜生教授 GPSS 国际奖项目“科学、道教与再启蒙”的主要目标之一便在于,倡导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些所谓难以捉摸的因而常被忽视或简单否定的精神因素,予以更本质的理解和合理的把握。

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填补了明代佛教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明代的佛教与社会》收录了陈玉女先生自 1995 年至 2008 年发表于各史学期刊及学术会议之有关明代佛教史的 12 篇论文, 其中, 《明太祖征召儒僧与统制僧人的历史意义》、《郑和施印佛经与兴建佛寺的意义》、《明嘉靖初期议礼派政权与佛教肃清——以“皇姑寺事件”为考察中心》、《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兼论佛、道两势力的对峙》、《明华严宗派遍融和尚入狱考——兼论隆、万年间佛教与京师权贵的往来》等, 主要探讨了佛教如何在政权势力盘根错节的京师地区, 取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社会资源和开拓有效的人际网络的情况, 指出这样的区域虽然拥有促进佛教发展的雄厚资本, 但置身其中的佛教, 不免在政治派系纠葛中陷入难以自拔的险境。而《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明代堕胎、产亡、溺婴的社会因应——从四幅佛教堕胎产亡水陆画谈起》、《明代妇女信佛的社会禁制与自主空间》、《明代佛教医学与僧尼疾病》、《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与佛教依赖》等, 则探讨了佛教植根于明代社会大众的内心形象, 信众们透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接触、认识佛教, 以及信众对于佛教的依赖与需求等问题, 指出这些均是促使明代佛教从事内在改变以适应外在环境需求的重要推进力。另外, 《明昆明太华寺供奉沐氏十二世像之历史意义》认为, 沐氏在巩固自身的云南政权时, 佛教信仰成为建构其自我威权的重要凭借。而《明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以木材、铜、铁等建材为主》则认为, 靠近京畿地区的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的取得, 除仍旧依仗着中央权贵的财力奥援外, 建材的采购与运输, 与其周边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交通网络及社会大众的信仰心理等条件密不可分。同时指出, 在营建所谓圣物建筑体之际, 因建地与木材的大量需求, 导致五台山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拜读全书, 深感其是一部研究明史、明代佛教史、明代社会史的力作。

第一, 方法新颖。

“新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四新”之一(另外“三新”是指“新材料”、“新角度”和“新观点”)。该书在, 陈玉女先生利用区域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方法概念来探讨明代佛教与社会的关系, 可谓方法新颖, 值得借鉴。例如, 《明昆明太华寺供奉沐氏十二世像之历史意义》, 就是借助对云南沐氏历代画像之所以被供奉在太华寺的可能因素这一区域社会史的探讨, 阐明了明代汉地佛教传播于云南地区的景况。而《明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以木材、铜、铁等建材为主》, 则是借助对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的取得与运输这一区域社会史的探讨, 来观察佛教乃至当时社会如何在高山峻岭的环境下, 完成星罗棋布、金碧辉煌的佛刹建筑, 如何取得所需的众多建材, 又如何搬运至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上, 其势必借助的人力、物资与运输资源如何等问题, 以此说明佛教的发展, 对国家、民众乃至环境的负面影响。另外, 《郑和施印佛经与兴建佛寺的意义》, 则运用了经济史的方法概念, 计算出郑和布施十一藏的耗费, 相当于其三十年左右的俸禄, 认为这光靠郑和自己的财力, 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在此基础上, 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 郑和之所以能够前后施印大藏经十一部, 并非单靠其个人财力, 而是多方条件的聚合, 包括朝廷的恩与、相关人士的协助等, 最终使其施藏宏远得以如愿以偿。如此新颖的研究方法, 不仅体现了作者思维的灵活, 更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

第二, 新论迭出。

学术贵在创新。没有创新, 学术便不可能引导科技进步、社会发展, 学术也就变得毫无意义。陈玉女先生《明代的佛教与社会》一书收录的每篇论文, 都会提出自己的学术新论。这些新论, 并非用于吸引读者眼球而胡编乱造的新奇之论, 而是建立在客观、扎实研究基础上, 实实在在地推动学术发展和进步的学术新观点。例如《郑和施印佛经与兴建佛寺的意义》, 通过分析指出, 朝廷之所以大力资助郑和频频施印大藏经, 最大的原因是其丰硕的航海功绩, 但同时也透露出郑和有专权独大之嫌。再如《明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以木材、铜、铁等建材为主》中, 作者通过对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的取得的探讨, 认为在营建所谓圣物建筑体之际, 因建地与木材的大量需求, 导致五台山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 指出慈山德清等僧人发出的拯救五台山森林浩劫的呼声, 并不完全基于防止森林植被流失或保护森林生态的立场, 而是由于在无法与官商势力勾结或对抗的情况下, 僧人们唯恐周边林地大量消失, 想借助身边可以依仗的官方势力来保护寺院周边的林木, 以此取得合理的林木使用权, 好让寺院建筑所需之木材不至断然流失。同时作者还指出, 国家花费社会极大的人力、物资, 投注在与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们并无绝对利益关系的建设上, 有时甚至为此而罔顾百姓生命, 这是一种浪费、扰民行为, 这对于建寺祈福的上位者来说, 无疑是一大讽刺。另外, 作者通过对《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明代佛教医学与僧尼疾病》、《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与佛教依赖》等的探讨, 认为经忏活动和佛门医学, 是明代佛教与社会接触的重要途径。这些新论点的提出, 补正了前人研究的疏漏讹误, 推动了学术进步。

第三,广征博引。

在此书中的每一篇文章中,陈玉女先生都征引了大量史料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广征博引成为一大特色。如《明太祖征召儒僧与统制僧人的历史意义》中有85个注释,《明嘉靖初期议礼派政权与佛教肃清——以“皇姑寺事件”为考察中心》中有98个注释,《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兼论佛、道两势力的对峙》中有120个注释,《明华严宗派遍融和尚入狱考——兼论隆、万年间佛教与京师权贵的往来》中有121个注释,《明代堕胎、产亡、溺婴的社会因应——从四幅佛教堕胎产亡水陆画谈起》中有171个注释,而《明代妇女信佛的社会禁制与自主空间》中更是高达240个注释。这些注释涉及到古今中外著作上千种,实为罕见,而且有些注释特别长,这体现了作者资料搜集的全面性、论证的细致性和学术的规范性,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明代佛教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该书在探讨明代佛教与社会的关系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学、礼教、风俗、信仰等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体现了作者知识的广泛性。

如果白璧求瑕,由于资料的缺乏,文中有些问题的论述,还缺乏全面性。如《明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以木材、铜、铁等建材为主》对五台山佛寺建材的论述,由于资料搜集所限,主要集中在木材与铜、铁等金属建材上,而缺乏对砖、瓦之类建材的详细论述。但相信只要作者一如既往地努力,此类问题定会得到妥善解决。我们拭目以待陈玉女先生能有更多名作与大家共享!

(卢忠帅,1982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积极应对当代宗教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宗教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 铭

2012年3月24-25日,由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宗教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州百合花饭店召开。与会专家4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代表中国宗教学学会发表致辞,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性,指出不仅要马恩列等经典作家的宗教观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还要关注宗教现实问题的研究,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研讨会分五场学术报告,学者们围绕着会议主题就(1)马克思主义宗教观、(2)宗教与社会现实、(3)在校大学生宗教认知教育这三方面展开发言和讨论。

一、深入、全面和中国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本质及其发展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本质,揭示了其理论发展。中央党校哲学部龚学增教授指出:“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论述因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有变化,但基本原理不变,其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加润国研究员指出“宗教批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错误理解、“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引导适应论”是对党的宗教理论政策的片面概括,他希望从马恩列经典著作中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浙江工商大学陈荣富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宗旨出发,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专门研究宗教思想,而是就哲学、政治和经济等问题论述了宗教观点。尤为重要的是,要用发展的眼光考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同内涵。不能简单地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关宗教的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中央党校哲学部侯才教授建议“从两个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方面,研究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宗教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因为两者都涉及到理性与上帝。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陈村富教授结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研究,强调从跨学科的视角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解决当代宗教问题的意义,在考察当代中国的宗教与社会时,